

权力学说:空间策略与媒介进化

郜书锴

摘要: 空间概念是地理学具有特权地位的因素,而时间概念则是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甚至所有社会科学中具有特权地位的因素。但福柯把空间概念用于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用于权力机制形成过程的研究,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和权力,形成了权力地理学的理论框架。论文第一部分从这一理论的空间策略入手,对福柯博大精深的思想进行粗浅的现实解读,以期从其知识谱系中寻觅智慧的点点星光。进而探索由于媒介进化带来的权力分化,从而形成的复杂交织的权力网络,这是论文第二部分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论文认为,权力是传播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不同的理论研究领域,权力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微观权力视野下解读新媒体与权力关系是一个新的阐释路径,论文以欧美国家在新媒体与权力关系理论方面重要论述为参照,揭示媒介或传播在人的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权力; 空间策略; 媒介进化; 新媒体; 传播批判

作者简介: 郜书锴,男,副教授,文学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焦作,454100)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 (2011) 04-0001-06

一、权力的空间策略与实践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理论的演进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称为地理学转向或空间转向,这一转向的理论来源是将空间概念带回到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或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试图以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图景,意在颠覆历史决定论和扭转空间在传统社会理论中受到轻视的现状。^{[1](44)}

西方马克思学者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其《阅读资本论》中曾经提出:“本文对空间性比喻(区域,领土,空间,形势,位置等等)的借用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它作为科学话语的有效性问题。”^{[2](206)}阿尔都塞把对空间比喻的借用视为必然,但认为它是不严格的,是一种倒退。福柯因此认为社会学家对空间概念的态度是贬损的,在他们那里,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福柯对空间概念的迷恋是对经典社会理论的反叛,他对人们的指责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这些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着迷。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效应的过程。存在着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的政治、权力的关系,它们是穿越知识的途径,当人们对它们进行再现的时候,能够指引人们通过区域、地区和领土这样的概念来思考支配的方式。”^{[2](205)}

地理学家指出,某种空间的比喻既是地理的,又是战略的,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地理话语和战略话语之间存在着概念的流通。福柯显然利用了这一理论,因此他强调指出:“如果努力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喻来解释话语的话,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2](206)}福柯希望借地理学概念重新解读空间、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他对空间概念运用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在于颠覆历史的知识观和权力观。福柯认为:“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

但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区域；区域是一个经济——法律的概念；位移：对自己进行移位的是军队、团体和人口。领域是一个法律——政治的概念。土壤是一个历史——地质的概念，地区是一个财政、行政和军事的概念。地平线既是一个绘画概念，又是一个战略概念。而在福柯的著作中出现的一个真正地理学的概念——群岛也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一种惩罚系统采取了散布的形式，但却覆盖整个社会。”^{[2](204)}地理学家显然与福柯的权力地理学异曲同工，他们从地理学发展的军事背景出发，认为地区就是军事区域，省份是一片被占领的领土，区域令人想起战区……在这里，地理、知识和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知识和权力构建其空间景观……一副地理学视野的权力地图已经清晰可见。

(1) 生物-地理-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从对人的空间的分配入手，因为规训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空间。如此空间比比皆是，例如学校、军营、医院，它们有明确的边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而正是这样的封闭性才能保证权力的顺利运作。但有时候并不如此，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边界，并且也不是封闭的，而这样的场所依然能保证权力的顺利运作，最典型的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城市广场。比如北京天安门广场，它在地理上显然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它依然是一个典型的权力场所——穿戴随便者不敢招摇过市，鬼鬼祟祟者敬而远之，打闹嬉笑者收敛言行举止，政治图谋者望而生畏……权力透过对人们身体、言行和举止的操纵和规劝，从而实现身体的空间化和场所的权力化。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生物-权力”。相同的例子还有师道尊严、尊老爱幼等，人们在道德权力和社会权力的约束下，内化为一种生物的本能反应与道德言行，这些反应与言行作用于生物主体，并受制于生物主体本身。这一生物权力经过长期的积淀还会形成地域特征，比如上海人的精明小气、浙江人的商业天才、东北人的义气彪悍、新疆人的能歌善舞，当然还有一些例子是负面的，比如四川的民工潮成为地域经济落后的象征，河南的造假事件被夸大成不劳而获的区域性心理特征。还有，一个地区的典型生物事件还会在一个时期产生影响，比如，SARS（非典型肺炎）爆发期间，不仅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区域性或国家性旅游业遭受灭顶之灾，原本熙熙攘攘的风景区曾是门庭冷落鞍马稀。当然，这一事件对国家或国际政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物——权力这一层面。

(2) 场所-地理-权力：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所设计的圆形监狱，本质上是全景敞视式的建筑学形象：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这一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察和一眼辨认。这种具备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建筑，或许是一个完美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这种设计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一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3](224-240)}在这里，福柯用建筑和空间的术语来对制度进行描述，人们的生活秩序本身也是制度的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每天都要选购用品的超级市场，它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无处不在的摄像设备和防盗装置，让每一个在场的顾客都暴露在电子“瞭望塔”的监视之下，规训建筑成为“生物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这些建筑场所还有庄严的政府大楼、威严的司法审判大厅、森严的外国驻华机构等。福柯说现代社会，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中国人受难的重要场所，它对人们带来的民族记忆将会深深植根于国人的内心，激发人们为建立永久与安宁的世界而身体力行。由此可见，作为场所的地理空间便成为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具有无数的空间安排以不同的形式宰制我们的生活，谁也无法逃脱宰制我们的空间，即使当这一空间不可见的时候，我们作为主体便会立即启动自我审查/控制机制。

(3) 位置-地理-权力：不管是封闭的权力空间，还是“开放”的权力空间，权力的顺利实施还需要以更灵活、更细致的方式利用空间位置。它依据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实现空间的划分。这样，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不但可以明确在场者和缺席者，还可以明确权力者的身份。比如，航空器上的座位安排：一人一座，首先是保证乘机者的位置（这与公交车和普通火车明显不同），而且还设置有头等舱、公务舱、普通舱等，明显可以区分旅客的某种“身份”。其次还是出于安全和意外事故处置的考虑。其他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政府的公务交往活动中，坐在上位（一般是坐南朝北的位置）一定是权力最大者，其他的位置依次按权力大小左右交互排列；在传统交往宴席上，德高望重的长者坐上位，他就座时大家要起座笑迎，他发话后大家才可以落座就餐。但在现代交往中也有变化，坐在上座的也许不是权力最大者，也不是年长者，而是财大气粗者，在商务酒会中已成江湖规矩，这时候，财富成为权力的象征。由此，施诸权力的人让自己的控制对象在空间上具有可见性。然而，权力本身则要寻求空间上的不可见性，它隐藏在权力对象无法企及的空间之中是最有威慑力的，这就是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在权力与空间关系上的辩证法。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中对领导人位置的排列，就是对位置—权力理论进行阐释的典型表征。

（4）地图—地理—权力：地理学家指出，地图作为权力或知识工具跨越了三个相承续的阶段：希腊人的度量，中世纪的探索，18世纪的审查。地图同这些形式相联系，从度量的工具转变为探索的工具，最后成为审查的工具（选举区的地图，税收的地图等等），但是地图的历史并不与福柯的编年史相吻合。地理学家引用了17世纪的旅行家和19世纪的地理学家作为例证，虽然其职业身份不同，但他们都是情报收集者，收集信息和绘制地图，然后直接为殖民者、战略家、商人和工业家所用。因此，地理学家大胆假设，地理学的知识内部也孕育了一种新的领域，它的疆域可以是国家、民族和地区。^{[2] (209)} 比如，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把版图划分为六大行政区域（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等），现在已经被新经济时代的发展战略新计划所代替，即产生了经济意义上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理划分，或者更加细分化的“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这是经济权力运作的结果，也是政治权力确认的结果。国际上，因为“地图”争议导致的权力冲突已司空见惯，比如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分界线，多次引发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水域“地图”也同样引发国际争端，发生在英国和伊朗之间的“伊朗水兵事件”，就是一例，伊朗逮捕英军水兵，理由是侵入伊朗水域，而英军断然予以否认。显然，对地图的确认也是对政治主权的确认，在中国的地理历史上，清政府的割地赔款条约，曾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大部分领土由于军事和政治上的确认而无法收回。祖国的港澳地区也曾被殖民“占领”，但由于没有在地图或得到军事政治的确认而得以收回，既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也维护了国家的神圣主权。

（5）媒介—地理—权力：邵培仁教授是国内媒介地理学的权威研究者，他认为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学术联系和媒介地理现象。首先，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其次，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样本。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第三，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第四，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4] 地理特征产生不同类型的媒介，媒介的地域话语又形成权力，反作用于地理面貌的塑造和审美。前年初，被称为“西湖第一高楼”的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轰然倒下，原本可以使用100年的寿命，仅仅13年便宣告夭折，引起了媒体高度关注。时隔9个多月，在杭州市规划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一黄金地块的买主香港嘉里集团将建起一座以85米高的五星级酒店塔楼为标志的建筑群，主楼比原来还要高出13米。消息一出，支持西湖周边限高，反对兴建高楼之声不绝于耳，杭州市规划局网站上杭州市民的反对留言更是铺天盖地。《杭州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规定》，该地块建筑基本控高（限高）按25米控制，局部可适当提高。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湖周边建筑的“限高标准”屡屡被

突破。时至今日,西湖边的建筑及天际线多次遭到国内外建筑专家的批评和质疑。杭州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杨键认为,在西湖边修建高层建筑,会对西湖造成一定压迫感,使西湖看起来越来越小,影响了西湖景区的整体美感。面对政策和舆论的重重压力,项目规划管理者表示,方案还处于概念规划阶段,嘉里建设将会根据市民的反馈意见对方案进行相应修改。青海湖的保护也是如此,这一示范性的地理景观在舆论和媒体的反复呈现中得到了权力的支持,因此政府承诺“决不让青海湖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其实,媒介本身也成为地理景观,美国的纽约时报广场、我国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和各地的报业及广播电视大厦即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它们还发挥着权力的作用,媒体不断报道有人爬上中央电视台的发射塔,就是当事者寻求媒介话语权力保护的举动。

(6) 神话-地理-权力: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神话的权力有时候甚至超过法律的权力,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们朴素的信仰之中。《山海经》一般被视为地理学著作,但它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因为它的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神话政治地理著作。更确切地讲,它以山川地理志的外观表现着现实世界与神话时空交织的内容,而这种虚实相间、半真半假的空间图式之实质,则是服务于功利目的的宗教政治想象图景,那就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5]福柯讲到18世纪末的地理大调查时说:“那时候人们在上世界上到处旅行,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并不是原始资料,他们真的是在探索,遵循着一种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自觉意识的规划。”^[2](210)]因此,《山海经》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因此,把《山海经》当做知识社会学的对象来研究,要比把它当做地理知识来研究更具有价值。地理方面的差异特征不只是科学研究所关注的,而且也是权力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妇孺皆知的“愚公移山”,这一传说宣扬的不仅仅是人类改造自然地貌的壮举,更是宣扬人类精神领域所需要的那份执著和毅力,因此历代政府和民间不断地生产与此相关的知识,并以此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产活动。

由此可见,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或者说是权力的容器。权力的空间化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权力作为一个生产实践背后隐匿的一整套的策略和逻辑的地理学背景。福柯理论企图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建构历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阐释权力关系与运作以及知识谱系与空间的关联,这对于深化社会理论对于历史、权力和知识的洞察力具有重要意义。福柯对空间的强调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突破点,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空间、权力和知识交织而成的生动图景。国内有学者指出,福柯实现了从后现代视域对知识、权力和历史的空间化解读。福柯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化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明显有别于之前的代表人物,从而凸现了他在这一特定社会理论脉络中的重要贡献。^[1](47-48)]福柯对于空间问题的“先锋性”的重视和研究,对于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无疑证明他是后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空间理论使地理学迈向一个新的学术进程。^[6]

二、媒介的进化与权力的分化

北美媒介环境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曾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倚重时间的媒介,另一类是倚重空间的媒介。虽然这一“不够科学”的分类标准不断为后人诟病,但他的学说与贡献却难以为人超越,因为他从根本上揭示了媒介演进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传统媒体作为大众传媒媒介,虽然兼有时间与空间的特性,但对时间和空间的最大限度的拓展却是由新兴媒介来完成的。众所周知,不管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传统媒体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理空间和传播时间,而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它们最大限度突破了传播的空间与时间限制,成为真正可以实现自由传播的新媒介。正如福柯代表的权力学派,他们对权力概念的阐释,对传播新时空的拓展具有积

极意义。正是由于对空间/时间拓展的无限追求，媒介的权力也得以由集中趋向分化，使之处于一个更复杂交织的权力网络之中，对其关注得以从宏观权力视野转向微观权力视野。

微观权力观对解释媒体权力具有启发意义。在传统的媒介系统里，公民与媒体的关系非常脆弱，而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异常密切，因为媒体主要作为精英工具而存在，是为精英群体或上层政治服务的。同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服务于精英或政治可以获得现实和预期经济利益，而媒体的普通受众不过是被二次出售的商品而已。与传统媒介系统不同，在新媒体参与到媒介系统以后，因为信息的控制更加宽松，信息的传播更加自由，因而公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制度结构之间、制度性权力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得以建立。同时，这种结构性关系改变了传统媒介体系里单向的关系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双向的互动关系模式。在这里，政权也不再具有垄断性的操纵权力，公民个体也不具有绝对的操纵能力，权力网络中的每一个点，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权力的分析，可以有诸多不同的角度^[7]：

(1) 话语分析。迪亚哥·格迈兹认为，就像传统媒体一样，新媒体所提供的传播渠道也依然被话语统治着，而话语就是权力。这些话语的目标就是去影响受众，从而建构起一个让权力凌驾于（公民）个体之上的媒介。媒介并不是一个中立者，因为任何媒介都要传播信息，而信息的选择和发布是有立场取向的，或者说是以政治目的为基本取向的。因而，新的媒介利用话语来建构或强化权力，实现与政治的“合谋”，这本身就是权力的话语实践。^[8]

(2) 文化分析。罗宾·曼塞尔认为，数字信息和新媒体内容，其生产成本低廉，全球市场巨大，自然成为当代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而政治决策者则利用新媒体这一有利工具，大量推广信息技术和推进产业发展。然而，社会学家则认为，信息产业的首要任务不是经济目标，而是新媒体环境引起的社会变迁，即新的社会权力关系能否创造更加平等的社会？早在19世纪50年代，哈罗德·英尼斯就提出了“信息技术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信息技术”给“意识形态”带来重要影响，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信息技术同样会对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9]

(3) 关系分析。特恩·A. 凡迪耶克认为，新闻媒体所具有的社会权力，不局限于媒体对公众的影响力，也包括媒体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大众传播的应用研究是一套科学方法，这一方法将有利于理解新闻媒体及其信息的作用，也需要对话语表述的结构和策略作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需要对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受众作深入了解。^[10]

(4) 网络分析。塞罗勒认为权力概念为认识互联网权力和知识提供了化繁为简的工具。对传播批判学派而言，权力概念是其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复杂交织的权力关系网络可以概括为：传播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与社会权力关系不可分割。因此，批判理论不会保持不变的常态，而是寻求对自身产生影响和自身可能影响的权力关系的认识与质疑。任何理论都必须建立在理性批评的基础之上，任何理论也必须接受应用层面的检验。^[11]

(5) 历史分析。曼纽尔·卡斯特尔斯认为，媒介已成为权力渗透的社会空间。他揭示了存在于政治、媒介政治、政治丑闻、政权危机与社会空间之间的直接关联，提出了互动性、平行性传播网络发展的新概念，即基于互联网和无线网络的新传播形式——大众化自我传播。结果，大众媒介和平行性传播网络的融合，直接把制度性的公共领域带入到新的传播空间，全民性、民主化的公共领域正在复苏。^[12]

从表面看来，空间策略与媒介进化并无直接关联，但深层分析发现，空间上的权力网络是由不同的点组成的，而传播媒介和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这些点中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要素发生着直接的关系。而且，无论中外，媒介本身要么是独立于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要么是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使

微观权力在相对独立运作的同时,又主动或被迫进入传统权力的运作机制,形成一定程度上权力的垄断。同时,新媒体又解构着权力的垄断,网络的自我赋权促成权力的自我救济,权力网络上的所有构成要素在不断的调整中趋向动态平衡,社会民主、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得以在其作用下促进发展进步,让权力造福人类才是所有参与者的终极追求。

参考文献:

- [1] 何雪松. 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 学海,2005(6).
- [2] 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24-240.
- [4] 邵培仁. 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 中国传媒报告,2005(3):64.
- [5] 佚名. 山海经的神话地理[EB/OL]. <http://www.studa.net/gudai/030430/2003430150809.html>.
- [6] 周和军. 空间与权力——福柯空间观解析[J]. 江西社会科学,2007(4):60.
- [7] 郜书锴. 论欧美学者的批判思维与学术启示——以新媒体与权力关系的最新理论研究为例[J]. 东南传播,2010(10):1-3.
- [8] Diego Gómez:Design, Power, New Media and Discourse. [EB/OL]. <http://www.dieproject.com>.
- [9] Robin Mansell:Power, Media Culture and New Media. In New Media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s,2004.
- [10] Teun A. van Dijk:Power and the News Media. <http://www.daneprairie.com>.
- [11] Theo Röhle:Power, Reason, Closure: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ew Media Theory. In New Media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s,2005.
- [12] 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1): 238.